

党史专家罗平汉新书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遵义会议实现“群龙得首”

□罗平汉

【编者按】本书是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原主任罗平汉教授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撰写的一部通俗理论读物。书名源自朱德1961年7月1日发表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组诗,其中的《遵义会议》一诗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在此摘编书中部分内容。

遵义会议能够实现历史转折,还得益于会议巧妙地避开一时难以说得清楚的政治路线问题,而集中解决当时最迫切、最关键,也是容易引起共鸣、达成共识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

关于政治路线问题,遵义会议决议认为“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193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致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委区的电报中也指出:“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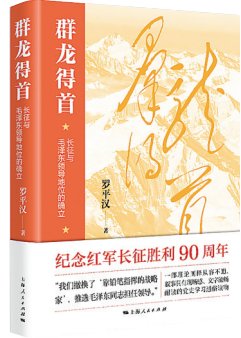
对于遵义会议为何只集中讨论军事路线问题,而肯定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路线是正确的,周恩来曾就此解释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正

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自然有很多原因,如实行“左”倾土地政策与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企图以弱小的红军攻打大城市、统一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等。但是,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军事上打了败仗。中共临时中央来到中央苏区后,一系列的挫折首先体现在军事上的失利,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越打越被动,最终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

长征初期,虽然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蒋介石设置的前三道封锁线,但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于湘江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若非毛泽东极力主张转兵贵州,中央红军恐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有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红军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军内形成了共识。

暂不涉及政治路线问题,而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十分重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成熟的



《群龙得首——长征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
罗平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党中央的体现。如果在遵义会议上讨论并试图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就会涉及许多的事与许多的人,不但耗时长,而且牵涉的人多。

因此,对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4年间政治路线的评价问题,遵义会议上作了正面肯定,这对当时维持党内团结十分重要。在随后过草地的过程中,张国焘曾以要讨论这几年政治路线问题为由做文章,企图否认遵义会议的成果,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以遵义会议已对政治路线作了结论为由予以回应,使其企图不能得逞。这个问题,直到延安整风时,由于条件已经成熟,才提出并作出结论。

历史学家许倬云:

“中国”两个字刻在我心里

□许倬云

【编者按】“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是95岁历史学家许倬云的人生遗憾,也透露出他深切的情感。《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本书记录了许先生生命最后阶段对年轻人的关怀、对家国的牵挂。许倬云2025年8月去世。在此摘编书中序言。

死去元知万事空

我和曼丽这几年经常讨论死亡。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想念父母。在我的想念之中,他们没死,他们还有一部分生命活在我的生命之中。

我在无锡已经买了墓地,碑都刻好了,它就在我父母的墓旁边。我父母当年在台湾故去前曾经嘱咐我们,有朝一日可以回大陆的时候,要送他们回家。后来,二老都归葬在无锡华侨公墓,我二哥、二嫂去世后也葬在他们旁边。爷爷、伯伯、叔叔、大哥,我给他们做了衣冠冢。虽然说死后无灵,但是我宁可信真有一个“灵”,我宁可相信我梦里见到的父母是真的在那里,我宁可相信母亲摸摸我的背,问我“痛不痛”,摸摸我的脚,说“给你擦点药吧”。

我已经95岁,尤其是最近几年的身体状况,常让我有朝不保夕之感。我比较担心的是,哪天我闭眼走了,我太太曼丽怎么过。这是我心里的悲苦之处,因为我比她大12岁。我知道她照顾我的生活相当辛苦,常常也会想是不是应该早点儿走掉。但是,哪天我走了,我不知道她会怎样。

我父亲当年是午睡醒来去拿报纸,在玄关台阶上踩空,一头栽下去,头碰到地上,56天后就走了。他走了以后,我的两个姐姐在台北陪母亲。每年夏天,我怎样在家陪她。我们尽了自己的力,母亲也不怎么孤单。子孙满堂,她感觉没有一个让她委屈的。

本来母亲最不放我心,后来我做完手术可以自己走路,事业上也立定脚跟,和太太结婚,生了儿子许乐鹏,母亲也就放心了。晚年的老人家过得相当舒坦,走的时候96岁。我和双胞胎弟弟许翼云回去陪了她两个月,我睡在病房的凳子上,弟弟睡在地上。老人家往左边看是我,往右边看是翼云,心里感觉很满意。姐姐们每天也来看她。所以,她走的时候说:“我没有什么难过的,而且我很好,马上要跟你爹爹见面了。”

死去元知万事空,只有我自己知道,忘不掉的、盼望的是回到父母身边。为什么我们要在故乡买墓地?为什么要将祖父父母和兄弟的墓安排在一起?就是这个道理。



1993年,许倬云在西安博物院观摩出土的青铜器。

暮年意外发现父亲墨宝

1932年,上海、江苏的沿江城市暴发了霍乱,死者无数。我的叔叔、婶婶、姑父,以及我14岁的大哥都在这场瘟疫中走了。那一年,我父亲41岁,在厦门海关监督任上。对他而言,弟弟、妹夫这两个帮手,还有儿子和弟妹都离开了,三四个家庭的生活都需要他一个人负担。那时候,“九一八”事变刚过,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我父亲是海军出身的军人,一辈子为国尽忠,面对如此的国仇家难,我能想见他当时的心情。

那一年,父亲去厦门虎溪岩寺,在那里留了四个字“心旷神怡”。寺里的老和尚把这四个字刻在了石壁上。最近,厦门的朋友偶然发现了这块摩崖,就拍了照发来,我才知道老人家还有墨宝在世。

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在我暮年将这四个字送到我面前,似乎也是先父在天之灵冥冥中安排的。因为,最近我的心情也不好。我看见世界上发生的种种天灾人祸,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民与民之间的纠纷,人与人之间的欺诈,实在是心里不舒服。但一想到父亲当年题写的这四个字,似乎冥冥之中他还在带我走一段路,要告诉我:世界是如此令人忧苦,你离不开、放不下、丢不掉。既然如此,该怎么办呢?好好做人,尽心为之,不要被压倒。父亲的这四个字,刚劲有力,好像他全身的力量都在这上面。我一直不知道他写隶书写得这么好,“怡”的那一笔一钩确实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也是对我的一个嘱咐,嘱咐我离开忧伤、悲苦。

我是三峡里的岩石

我这一生的感受,基本上就是艰难困苦。从身体上的艰难困苦,到国家命运的艰难困苦,

再到时代的、世界性的艰难困苦。在艰难困苦里,我是三峡里的岩石,水流怎么冲击,我在水里边悄然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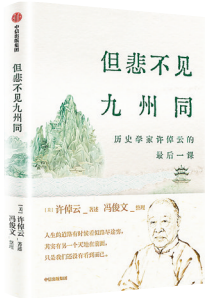
我的孙子从19岁开始就知道要负自己的责任。他的志愿是当一个好的中学教师。中学教师的待遇不如大学教授,差得很远。他愿意接受一个比较差的待遇,选择这个职业,我很高兴。我不需要他做一个出类拔萃的财主,也不需要他做个能获诺贝尔奖的人。他能够得到机会将学生带大,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一辈子的经验就是俯仰无愧。被动承受之中,要自己站得住脚跟,仰得起头。仰着头,是不低头求饶乞怜;脚扎根,是不倒下、不退后、不停止。时时刻刻改良、调整自己的世界观,时时刻刻修正自己的偏差,时时刻刻安顿自己的心。安顿你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回顾一生,我觉得最重要的遗憾是“但悲不见九州同”。我是在抗战中长大的人,“中国”两个字刻在我心里。七八万万的兵员在阵地上死掉了,三四千万的人被轰炸,尤其是在逃难时期,我们从农村、城市路过所见到的,我一辈子不能忘。我对中国老百姓怀有深厚的感情,经常想起当年的情形,他们是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勤劳地维持自己的日子,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之内彼此扶助、彼此帮忙。

面对当前世界的种种乱象,我已年迈,无从挽救。我只能自己求心安,也只能借助种种机会,向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说这些话,将我自己的心打开给你们看。

95岁,就等于一个动物快死了。我拼了老命,要把这一生的感受传达给别人。人之将死,其鸣也哀啊!



《但悲不见九州同:历史学家许倬云的最后一课》
许倬云 著述 冯俊文 整理
中信出版集团

·门外弹乐·

“和而不同”的极致

□梅明蕾

就表层意思而言,最能体现“和而不同”的莫过于交响乐团。一个乐团拥有数十乃至上百名乐手,他们掌握着数十种乐器,这些乐器又组成十多个不同声部,而所有声部则在指挥的手势下构成统一而和谐的交响世界。

这是一个相当高级而奇妙的过程。说到“高级”,就有低级。譬如数十乃至上百名乐手仅奏一个声部,百十号歌者聚在一起齐唱一个旋律,那样出来的声音倒是高度一致,可这缺失了和声、对位、织体、强弱等音乐要素的低级“一致”又何其单调乏味,更何来“交响”一说?所以,将各不相同的元素叠加后形成的“和而不同”,才是音乐发展逐步走向“高级”的必然结果。

当然,都是“和而不同”,也有境界高低之别。不久前,柏林爱乐在伦敦逍遥音乐节上连续举办了两场音乐会,当地媒体也接连刊出两篇乐评文章,一篇追问柏林爱乐是否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团,另一篇则在首演结束后,以近乎毫无保留的赞美作出了回答。

乐评人高度赞赏柏林爱乐自有道理。英国本土不乏伦敦交响乐团、伦敦爱乐乐团等世界名团,柏林爱乐又在音乐会上献演了英国著名作曲家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该曲则是英国乐团的“看家作品”。这样看来,柏林爱乐可不就有班门弄斧的意味?然而乐团正是“以这部并非常演的英国作品征服了伦敦听众”,这种赞美就格外显得非同一般了。

乐评中的一段话,尤有深意存焉,值得照录如下且稍加解析:“柏林爱乐最难解释的能力,是把一群个性强烈的顶尖演奏家变成高度统一的集体。乐手首先把自己视为独立音乐家,其次才是乐团成

·技术与·

智能社会也有“反治理”

□刘永谋

在未来的智能社会中,智能治理的应用会更加普遍,深入和系统,产生的问题和风险也会同样普遍和复杂,此即反治理现象。目前针对智能治理的反治理现象,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第一,智能低效问题。一般认为智能化肯定提高工作效率,但研究表明事实未必如此。比如,有实证研究表明,当一些例行审批交给智能系统,出了问题都不知道找谁负责任,最后只能把板子打在AI身上。美国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评论说,“电脑使得政治、社会和商务机构实现自动化运行,在这个过程中,电脑未必使这些机构提高效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使人不注意这些机构是否必须改进以及如何改进。这些机构……只不过更加吓唬人、更加技艺化,或许还多了一点权威,然而它们的预设、理念和理论里的缺陷却原封不动。”

第二,技术怠工问题。AI时代出现了与新科技应用相关的怠工、摸鱼方式。比如,借口不熟悉新的信息系统而逃避责任,要求进行技术培训,要求更新设备。再比如,App崩溃、电脑坏掉,系统升级,都可以成为技术怠工的新理由。

第三,智能破坏问题。黑客远程操作机器人犯罪,网上智能合成语音,AI“换脸”诈骗,3D建模动画解锁人脸识别系统进行盗窃,AI垃圾电话、垃圾信息泛滥,用机器人“网络水军”造谣、网暴和操纵舆论,

·序跋集·

为中国医疗史研究正名

□梁其姿

中国医疗史的研究者,往往很羡慕西方的同行。最主要的原因是医疗史这个领域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不但相关的专著、学术期刊、专业学会已很多,而且不少大学提供医疗史课程,甚至医学院里都有医疗史必修课程,以深化医学院学生的人文修养。现阶段西方医疗史专著和论文的主题已非常多样化,适合不同程度、不同兴趣的读者;言下之意,医疗史在中国史领域有点偏门、有点不入流,甚至乏味,所以浅尝其中滋味即可,不宜久留。这些质疑不是没有道理。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是中国传统医学在清末巨变后的历史书写中,从来未能蜕变为“英雄”。主流的历史学也始终以怀疑的眼光对待医疗史研究。

最令中国医疗史学者羡慕的,是西方医疗史这一领域并不处于史学的边缘,而是已融入整体的西方文明史,成为其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

相对于发展成熟且多元化的西方医疗史,中国医疗史或医疗社会史在中国史学范围内的“妥当性”似乎仍存在质疑。近年来,我经常被问到为何仍在做医疗史,为何不回去做传统的社会史;言下之意,医疗史在中国史领域有点偏门、有点不入流,甚至乏味,所以浅尝其中滋味即可,不宜久留。这些质疑不是没有道理。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可能是中国传统医学在清末巨变后的历史书写中,从来未能蜕变为“英雄”。主流的历史学也始终以怀疑的眼光对待医疗史研究。

其实,医疗、保健、药物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分量本来就极重。在最高的层次,社群与政府处理疾病的策略与方



梅明蕾 媒体人,爱乐者,读写驳杂。

员。他们没有用服从消灭个性,而是在演奏中不断倾听和回应,让差异最终汇成力量。”

独奏家与乐队的乐手,无论是演奏理念还是演奏方式都大相径庭。独奏家强调突出的个性,如是在能与乐队的合作中不被人多势众的群体所淹没,其个性魅力也会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而乐队则是一个整体,乐团(队)的风格由所有团队成员合作体现出来,于是其中的每一个体必须以放弃个性为前提来适应整体,这已然成为所有乐队成员必须遵循的铁律。

问题在于,是人就有个性,更不用说一个艺术家,彰显个性是本能。乐团为能使百十号人“和”到一起,竟要求乐手们放弃或弱化个性,这无疑与演奏家的本能形成巨大矛盾。为解决这个矛盾,最终还得靠教化和训练,所以不少音乐院校里又有了新的分支“乐队学院”。

不过就我所亲眼见识过的柏林爱乐,舞台上个个具备独奏家资质的乐手却表现得全情投入而显得格外张扬,以至于看上去绝对“没有用服从消灭个性”。这样的个体组合起来的整体,非但不“违和”,反而发出一种具有标志性的至美音响,或者说,“和而不同”已提升到一种极致境界。

我相信柏林爱乐的乐手们一定深谙独奏与和奏相异的理念和方法。与普通乐团乐手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简单且教条式地靠“消灭个性”来创造统一,而是在演奏中更敏锐地倾听其他声部并与之形成精妙互动,让个性赋能整体,“让差异最终汇成力量”,最终创造出奇迹。当然,这需要非比寻常的个人能力和音乐素养,更不可缺少乐队指挥将个性丝滑融入集体的创造性。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有《智能革命后的世界》。

用深度伪造散布虚假信息等等。这些智能破坏尤其是机器人犯罪问题,不仅更难被察觉,而且责任主体更难厘清,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第四,官僚主义智能化问题。官僚主义最重视文件和数字。官僚们从文件了解世界,眼睛里看到的是一个纸面世界,而非真实世界。在文件中,他们对各种数字印象深刻,用数字判断政策的效果。至于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又是否真实,官僚们并不探究。所以,官僚倾向于制造更多的文件和数字,智能技术迎合了此类倾向,因而官僚主义往往“重视”AI的应用。而信息越多,就越需要更多机构处理,于是官僚机构不断膨胀。

最后,过度治理问题。比如,一些地方密密麻麻安装各种摄像头、测速器等电子监控设备,浪费人财物力,收集大量垃圾信息,陷于信息过载之中。

实际上,很多社会参数是没有必要获取的,很多“小错误”应该交还给道德领域,甚至要被AI时代所容忍。

梦想彻底消除反治理现象,在现实中根本做不到。因为人不是按标准行动的机器。一个人不管多么好,偶尔也可能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错误,如果智能社会试图用各种各样的规矩,把每个人随时随地约束起来,这不仅是可怕的,而且也不可能实现。



摘编自《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增补版)》序言。

式,均能反映社会或国家治理的主流理念。在中间的层次,专业医生、艰涩的医典其实并没有垄断对身体、疫病的想象与解释。处在医疗关系最底层的病人或其家属,其实都各有一套身体观、疾病观、死亡观等。对史学研究者而言,这些林林总总的观念等重要。因此,医学知识系统的发展与整个文化的发展应有密切的相关性,而史学研究者的主要责任就是要找出这一相关性。

记得史学前辈何炳棣先生私下闲谈时曾说过一句话,是关于研究方法的,大意是:我在大海里拼命往岸边游,不要问我姿势正规不正规、漂不漂亮,总之我能游上岸,就是成功。进入医疗史这个新领域,就是要抱着冒险精神与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中国医疗史里有太多有趣的课题仍在等待学者发掘,其中不少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问题。如果年轻学者能掌握更多有利的分析工具和史料,坚持走下去,未来的医疗史研究就可在更深厚的描述与分析的基础上,逐步向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范围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有一天才能找到医疗史的真正活力所在,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古代和近代的中国文化。那时,研究其他文明医疗史的学者,也不得不参考中国医疗史的著作。相信有一天,中国医疗史会真正从“过去的另类”成为“未来的主流”。

快 览

《帝国金脉:晚清的橡胶、股票与铁路》
高华声 林可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10年前后,上海爆发了一轮疯狂的橡胶公司股票炒卖浪潮,由此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全球橡胶价格下跌、西方资本肆意投机掠夺、国内金融机构介入过深,以及清政府对市场缺乏监控和政府内部党争不断等原因,此次危机最终引发上海等地的钱庄大规模倒闭。

《我住长江尾》
段志强 著 中华书局

世界越来越快,我去岛上种菜。2021年冬,复旦大学历史学家段志强从上海市区搬到崇明岛,教书之余,种菜读书。本书记述了作者五年来春耕夏长秋收冬藏的种菜日常及与岛上乡邻的交往互动。作者将广博学识融入田园实践,赋予朴素生活以独特的人文意趣。文字轻松灵动,幽默处令人莞尔,深情处直抵人心。

《鸡蛋是食物吗?》
靳忠效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个科技创业者对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事物的不同角度的看法,以短小精悍、生动丰富的事例写成50篇短文。一米的中间是哪里?为什么偶然会改变人生?人生的自由像风等?职业运动员如何提高自我?阅读本书,读者可以学会打破常规思维,培养多视角看问题的批判性思维。



《畸人哲学十篇》
朱有松 王远宁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庄子》:“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畸人,即特立独行、不流俗,却更接近天地大道的人。全书围绕认知、人性、竞争、财富、科技、艺术等十个根本问题,展开一场横跨中西、贯穿文史哲的思想漫谈。这本书不教你“更成功”,只帮你“更清醒”。

《写信人》
[美]弗吉尼亚·埃文斯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在国外上市一年销售超过200万册的现象级小说,由书信、邮件、便条和未寄出的草稿构成,全部第一人称叙述,读者需要像侦探一样从字里行间拼凑信息。通过一封封的信,主人公像剥洋葱一样逐层剖析自我,让读者跟着潸然泪下,深深共鸣。原来,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史诗。

《素水》
[加拿大]安妮·卡森 花城出版社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第一部分设想今时采访一位古希腊诗人;第二部分是关于兰花和奥维德等多主题的微型讲座;第三部分转而想象一位15世纪的画家在意大利出席现象学会议时被耶稣附身;第四部分用文字构建了一系列神秘镇的照片;第五部分则带着我们去追寻高深莫测而又亲密的水的人类学。(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

